

# 于公故里新发现于成龙文化重要文献资料

## 《贺总督兵部尚书于公生日序》

**本报讯** 近日,方山县于成龙廉政文化园收集到一份完整的于成龙文化重要文献资料《贺总督兵部尚书于公生日序》,该文献长37cm,宽26cm,共三张,为纸质手书,明确为薛熙撰书,蔡方炳阅。该文献是研究于公廉政思想重要的佐证材料。

于成龙文化研究学者高林清介绍说,于公去世后,文章散佚严重。于准重刻《于清端公政书》的时候,收集了一部分,作为附录。于成龙自幼苦读诗书,诗文水平造诣很高,多与同僚、同乡、同学、朋友有诗文交流。因此,在其历仕之地的湖北、福建、河北、江苏等地一些文人的文集、诗集中仍然存有一定量的于成龙的文章和诗词。特别是同僚、文友的家属的各种庆典,修家谱的序言,以及捐款修庙修桥这种公益事业的文章保存量可观,只是还没有被有效挖掘利用。这

份340年前手书弥足珍贵,反映当时于公做人做官的品行德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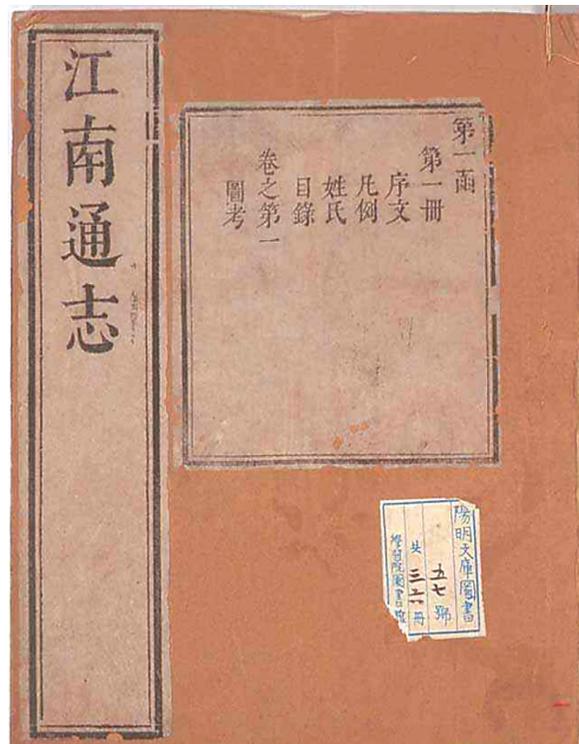
薛熙,清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徙居常熟。字孝穆,号半园。薛敬敷次子,汪琬弟子。秀才。有狂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参与纂修《江南通志》。三十三年(1694年)客居广东广州,与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结交。后不详。

蔡方炳,(1626—1709)字九霞,号息关,江苏昆山人。明末山西巡抚蔡懋德之子。明季秀才。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于成龙总制两江,重其学行,邀请其参与编修《江南通志》。

资料显示,薛熙,蔡方炳都负有才名,都没有出仕为官,但都受于公礼聘,参加《江南通志》的编撰。这份文献记述了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于公寿诞时,大江南北都或文或诗庆祝于公生日。薛

熙虽然只是一介布衣的身份,但也和藩臬大吏一起拜见了于公。拜见于公的时候,为了不让薛熙有压力,于公撤戟盾,退兵卫,在后堂坐下来探讨《江南通志》编撰过程的一些事情。薛熙感叹于公礼贤下士之心,是洞悉天下万人万世之心。这和《清史稿》记述于公为官时与百姓如家人父子,百姓可以直趋大堂后堂与公交流的情状吻合。这是于成龙清端公生命的最后一个生日,次年四月十八日,于公就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

山西省于成龙廉政文化研究会梁富正先生推断,于成龙早在湖北做官的时候,就该与当地和很多文人墨客有笔墨文章的交流。比如生前刊刻的《于山奏牍》,是其幕僚李中素搜集整理。李中素是湖北麻城人,即为于成龙湖北黄州知府任上结识并成为其幕僚的代表。(闫卫星)



江南通志

## 一部恢宏的红色史料

### 《吕梁奋斗史》出版

张颖

的关于吕梁近现代史的资料,从党的早期斗争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吕梁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烈士,《吕梁奋斗史》收录辛亥革命以来,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近万名。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队伍的革命烈士184名,有晋绥边区表彰命名的各类战斗英雄、劳动模范75名,有历次革命战争中立功受奖的英雄人物28名,还有1978年前的省级以上劳动模范219名,以及中共吕梁市(地)委表彰命名的“当代吕梁英雄”31名,还有吕梁南下干部2520名。这3093位典型人物,有驰骋大江南北的吕梁籍人士,如华国锋、贺昌、张叔平等;也有转战吕梁,为革命事业付出生命的非吕梁籍人士,如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刘志丹、毕士梯、杨森等;更多的是为保卫家乡,热血洒在吕梁这块红色土地上的吕梁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刘胡兰烈士。这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吕梁奋斗史》以县为单位,一县一卷,加综合卷,计15卷。这套系列丛书从几个重要节点:红军东征、抗日战争、晋西事变、解放战争、南下等等,展示了吕梁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与功绩,吕梁人民养兵十万、牺牲一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蕴含着真实可感、形象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例。我们试着讲给学生、讲给老师们听,大家觉得这些事就像发生在昨天,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些生动的资料,更易产生共鸣和力量。

于是,学院决心编辑一套丛书,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在学思践悟中铭记历史,笃定为国为民初心,勇担“厚德、强能、精技、报国”的使命;为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系列教学参考书目,又立足自身优势,不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打造高精尖水平思政课,以扎实行动推动思政课建设发展;也为吕梁奋进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中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吕梁革命文化是吕梁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吕梁奋斗史》系列丛书所展现的宝贵的地域文化资源,有效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比如针对思政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针对校园文化的建设以及其它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等等,对于切实提高大学生整体的思想道德素质,对于吕梁优秀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吕梁奋斗史》系列丛书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间,吕梁山区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晋绥边区核心地区。在那险峻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赋予吕梁儿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英雄气概,铸就了一代代吕梁人的铮铮铁骨,谱写着吕梁人革命斗争与艰苦创业的时代华章,孕育了“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吕梁精神。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政教师们一直在探讨如何引导学生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从而补足成长中的精神之钙,打牢信仰之基,汲取奋进力量,勇担时代使命。机缘巧合下,学院思政部拥有了大量

## 《红楼梦》“关夫子坟”的三重意义

吕世宏

《红楼梦》五十一回李纨评价薛宝琴《蒲东寺怀古》诗,发了一段议论:“况且他原是到过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单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关夫子一生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及至看《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自古来有些名望的人,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皆有注批,老小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牡丹’的词曲,怕看了邪书。这竟无妨,只管留着”。

这是《红楼梦》里至关重要的一段话,交代了三件大事:曹雪芹游过山西、贾府在运城之北、曹雪芹不惧文字狱。也就表达了三重意义,一是地理意义,一是历史意义,一是思想意义。

第一件交代了曹雪芹漫游了山西,《红楼梦》与山西有关。“况且他原是到过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说薛宝琴到过这个地方,其实是交代曹雪芹自己来过山西普救寺,而且曹雪芹知道普救寺里有好事者弄出了诸多《西厢记》故事人物景点,是为了吸引游客的,因为大家知道西厢记本来就是唐代人写的传奇小说,普救寺里的西厢记景点不过是好事者为之而已,所以曹雪芹说普救寺里的这些古迹是用来愚人的招揽游客的。曹雪芹如此熟知普救寺内景物,说明曹雪芹一定来过普救寺。从北京来永济普救寺,毫无疑问需要一路漫游晋中盆地和临汾盆地。为什么提到蒲东寺会想到关夫子坟?因为蒲东寺与解州关帝庙关家都在古蒲州地域,距离只有百余里,这些地方都是他漫游过的。

第二件交代了贾府与金陵的相对位置。关于此地理意义,我在《红楼梦京中在晋中》一文中有过论述。中国关羽墓仅有四座是历史确定的,身在当阳,首在洛阳,成都还有个衣冠冢,故乡解州有衣冠冢,除了这些再没有什么关夫子坟。所谓“上京”路上见到的三四处“关夫子坟”乃特意暗示小说里的“长安”背景地在关公故乡山西境内,在运城之北。其路线图是金陵—当阳—洛阳—运城—解州—京中,这是来山西晋中的路线图。《红楼梦》批文有“何必定用西字,读之令人鼻酸”,当指故乡山西。这里有个疑问“三四个”到底是三个还是四个?应该是“3+1”模式,就是说关夫子坟共有四个而一路上只见了三个。

第三件大事即禁书问题。曹雪芹借李纨之口明确说明《西厢记》《牡丹亭》已经是邪书,就是说被列为禁书了,而历史上《西厢记》被禁正是在乾隆十八年,显示小说创作于乾隆十八年左右。曹雪芹也明确表示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和禁书效果不是十分有效,因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戏剧很难禁绝,书可以禁传焚毁,然而男女老少口口相传,人人皆知,甚至于卦签上都有,谁能封禁了老百姓的口碑相传?所以曹雪芹对自己写的小

说将来被禁没有担心。

关于此历史意义,我在《关公何时敬称关夫子》一文中分析,清康熙四年朝廷尊关帝为“夫子”,雍正三年敕题“山西关夫子”,以皇帝的名誉题名“山西关夫子”,必然上行下效,所以雍乾时期尊“关夫子”最为流行。明代尊关公为关帝,是将他尊为神圣,突出了关帝的祈福功能。康熙以来强调“关夫子”是将他与孔子同样看待为圣人了,突出了教化功能。顺治年间朱之俊曾经倡议关帝庙应称关夫子庙,便于与孔子对应,这一建议还是传开了。结合乾隆禁《西厢记》,可以肯定《红楼梦》创作时间与曹雪芹生活时代是吻合的。

借关夫子坟一笔,曹雪芹也告诉大家《红楼梦》小说的主题是弘扬中原文化的。关夫子人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小说里的柳湘莲、冯紫英等正是关公精神的延续,而贾珍贾敬贾琏等人则丢掉了忠义传统,最终导致贾府的衰落。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法则。

长期以来,许多人将关夫子坟误解为关帝庙,因而掩盖了这一关键细节的重要暗语,因而忽视了此重大意义。2000年宁波大学学报《红楼梦中的关羽》一文解释“坟多,就是封号多,庙多,像多”,还说什么全国有许多关羽墓,认为是李纨讽刺封建皇帝的,显然作者对关羽墓的真实情况很不了解,强行将关羽墓与关帝庙混淆成一个概念。2013年红楼梦学刊《比较红楼梦与水浒传中的关羽符号》一文提出“因为关羽在历史上鲜有土坟,多为庙宇”因而推定《红楼梦》的关夫子坟即关帝庙。将关夫子坟解释为关帝庙混淆了实物概念,掩盖了曹雪芹真意。坟是坟墓是庙不可混为一谈,关帝庙在中国千千万万,而关王墓在中国确实只有四座。再如孔夫子墓只有一座,孔庙则全国各县都有过,怎么可以将坟墓庙宇混淆等同?俗话说一人一座土馒头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一座坟就够了,而关夫子竟然有四座,李纨感叹关夫子坟多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是因为人们“敬爱他生前为人”,这就明确认为四座关公墓不全是关公葬地。不能因为墓地有庙,就混淆坟与庙的差异。庙可以多修,但修坟则是很有讲究的,曹雪芹暗示当阳、洛阳两地是实有关羽葬身之地,而解州关帝家正是因为敬仰关帝人品又是故里而设立的衣冠冢。

总之,上京路上“三四处关夫子坟”是《红楼梦》小说里的一大关键,是破译《红楼梦》真相的一大穴位。这一大关键,安排在小说高潮部分五十一回,曹雪芹借薛宝琴怀古诗交代了小说的题材背景和主题内容。不仅说明贾府长安都在晋中平原,而且说明《红楼梦》小说完成在乾隆时期,是曹雪芹利用明末二府历史题材而创作的怀古大作。

观点

